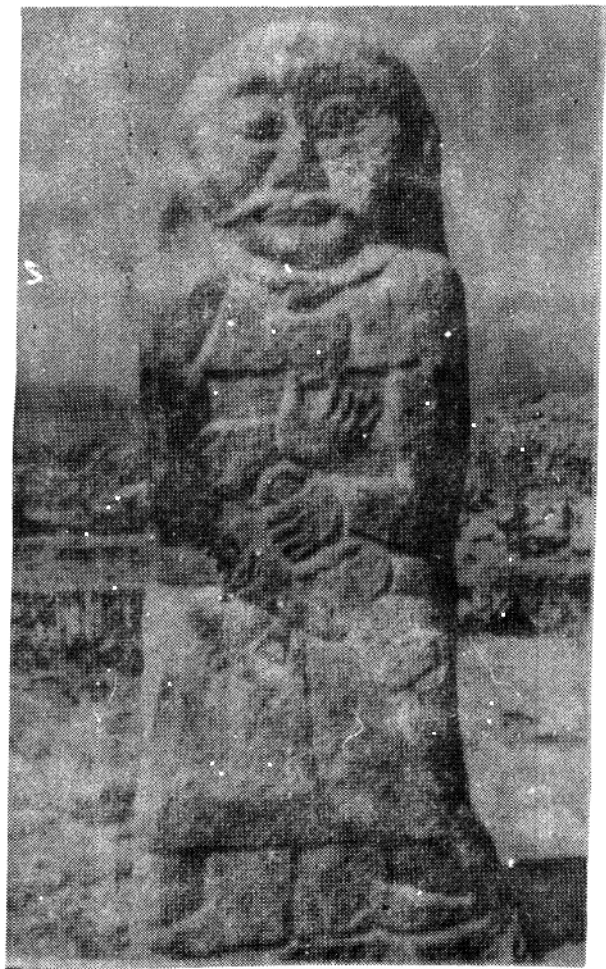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世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

突厥社会性质研究

吴景山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温泉县阿尔卡特石人(高 2.85 米,面东)



昭苏县草原石人(高2.30米,面东)



翁金碑(正面)



翁金碑(側面)



噉欲谷碑

目 录

自序	(1)
一、引言	(3)
二、突厥的族源、发祥地以及社会分期	(5)
三、关于突厥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现状	(23)
四、突厥建国前的社会状况概述	(29)
五、突厥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辨析	(38)
六、西突厥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	(82)
七、东突厥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	(120)
八、后突厥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	(139)
九、结语	(183)
附录一、突厥可汗世系表	(185)
(一)、突厥汗国世系	(187)
(二)、西突厥汗国世系	(188)
(三)、东突厥汗国世系	(189)
(四)、后突厥汗国世系	(190)
附录二、突厥大事纪年	(191)
后记	(252)

自序

本书的作者并非是研治突厥问题的专家，严格地说，他只是涉足于这一学科领域的业余初学者。说其“业余”，是因为本人的兴趣广泛，且有着时常爱往下面走走的习惯，这也就导致了自己在治学方面不免有些杂乱之嫌，数年来无论是在西北地方史、交通史、民俗学、博物学等方面都下过一些功夫，尤其是近年来对于金石学的浓厚兴趣，更是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精力，研治突厥史也只好在忙里偷闲的时间来进行。

说自己是个“初学者”也绝非是过谦之辞。因为我开始受命搞突厥史研究是在1987年秋季，当时不仅要继续完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而且还要给本校科学管理系的本科生首次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程，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备课，一边讲授，匆匆忙忙而不得片刻闲隙，对于那个既陌生而又不得不问津的突厥史也就只好搁放在了一边。自1988年初，虽然开始了对于突厥史料的全面了解与搜集整理工作，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自信，在3月27日，我还是想改变研究课题而转向匈奴史，最后只是在导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正式开始了对于突厥问题的钻研。谁知当我一旦投入之后，一个神奇而又迷人的世界就逐渐清晰而全面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对于它的研究兴趣从此也就日趋浓厚而不减，甚至当我的孩子还未来到人世时，就自得其乐地给其取名为“突突”或“厥厥”，尽管这当中有一些玩笑的意味，然而对于突厥史的偏爱之情却由此可见。

岑仲勉、林干等诸位学术前辈，曾在突厥史研究方面作了大

量艰巨而浩繁的工作。但是不观沧海不知沧海之大，当我们将这一学科作一认真而全面的审视后就会发现，其中仍有许多尚待开拓耕耘的空间。数年来，我曾先后撰写了《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突厥并非以铁立国辩》等十余篇关于突厥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这本书中就容纳了这些成果中的许多内容或观点。

本书名之曰《突厥社会性质研究》，却并非是有意识、而机械地陷入到“社会性质”这一似乎陈旧课题的是非纠缠之中去，作者只是试图以它作为阐述突厥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婚姻人口等问题的一条主线，使人们能对突厥的发展历史有一全面的了解。为了实现这一宿愿。我抱着认真而严肃的态度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当然，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否能与客观效果相符合，这只有让诸位读者在通读本书的过程中去作出公允的评判。

吴 景 山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兰州大学

一、引 言

突厥，是继匈奴、柔然之后于6世纪中叶在我国西北地区兴起的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从公元552年攻破柔然，阿史那土门正式称汗建国，一直到公元745年白眉可汗被回纥军队击杀而败亡，在前后历时近200年的岁月里，它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行动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突厥兴衰发展的历史也就一直为中外史学家所瞩目。尽管各国学者对突厥历史的研究作出了许多成绩，但由于其本身内容的复杂性，至今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多年来关于突厥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不同的社会性质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对于它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突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因而，它也就成为我们研究突厥历史应该解决的首要课题。

自从50年代中期开始，民族史学界的前辈马长寿先生就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对突厥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其后林干先生以及侯尚智、张广志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对于阐明介绍突厥社会的性质问题作出过一定的努力。1983年，樊圃先生在《文史》杂志上又连续发表了长达4万余字的论文，叙述了自己对于突厥社会性质的独到见解。由此可知，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突厥社会性质的研究还依然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与兴趣。但是，由于人们对于史料的见解以及方法论的应用上所存在着的种种偏差，因此导致了各位学者间的认识不同，观点各异，从而也就使最终的结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为了使人们能够

比较客观地认识、评价突厥社会的历史进程，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突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作一全面的考察与分析，以求在对众多的史实进行评述的过程中，使人们的认识尽可能地趋向统一。

在对突厥的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弄清与之相关的这样两个问题，即突厥的发祥地在何处，对整个突厥社会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分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便于我们对突厥的考古资料进行利用，又可以使我们的分析论述显得更有条理。

二、突厥的族源、发祥地以及社会分期

突厥的发祥地与它的族源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关于突厥的族源，自古就是一个众说不一的问题。综合史书上的各种记载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说法：

1. 突厥为匈奴的别种^①；
2. 突厥出于匈奴之北的索国^②；
3. 突厥源于平凉杂胡^③。

对于这样几种不同的观点，杜佑在编纂《通典》时索性进行了相应地含混处理：“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④

到19世纪末叶，人们在漠北的鄂尔浑河畔发现了古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由于在这些突厥人自己撰写的碑文中有“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⑤的表述，显然，这又给关于突厥人族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多年来，人们根据对上述种种说法的不同理解，又纷纷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并且参照其它相应的史料从语言学、人种学

① 《周书》卷五十《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

② 《周书》卷五十《突厥传》：“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

③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匈奴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

④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⑤ 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载《国立北平研究院务汇报》1935年第6期。

韩儒林《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译释》，载《禹贡》1936年第6期。

岑仲勉译作“九姓乌护，本我族也。”参见《突厥集史》下册。

耿世民译作“九姓乌古斯，本是我的人民。”参见《突厥文碑铭译文》，载林干著《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按乌护、乌古斯、回纥均为同一词的不同音译。

等不同的角度入手，为各自的观点提出了许多新颖的依据。目前学术界对于突厥族源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1、突厥与铁勒同族，他们同为秦汉之际的丁零。

王日蔚先生在30年代即曾撰文，认为高车、铁勒、回纥均为匈奴的后裔，而此三者实皆汉之丁零。丁零与匈奴是同族，属突厥族系，故丁零为突厥族。而丁零在北魏时称为高车，南朝仍称之为丁零，或又称之为敕勒，隋季史书则称之为铁勒。^①马长寿先生认为隋代以前的丁零或敕勒和隋唐时的铁勒，他们的语源是相同的，因此不妨称之为突厥语系诸族的共名。突厥人就是丁零人或铁勒人中之一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突厥诸语族之一族。^②林干先生则认为：“‘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这是突厥人自己的说法，当是最可靠的说法。按回纥为铁勒族的主要构成部分，突厥既与回纥同族，可见突厥是属于铁勒的族系，是铁勒族的一支。而铁勒则是战国秦汉时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高车（敕勒）。”^③至于为什么有的史书上认为突厥出自平凉杂胡，林先生认为，在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之前，铁勒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地广阔，部属众多的庞大族系，因唐代撰修《隋书》时，突厥已建立了强大的汗国政权，铁勒各部尽被其征服，沦为其附庸，故《隋书》的作者对于突厥与铁勒的族属关系已不甚清楚，因此非但在《铁勒传》中未把突厥一支列入，且在《突厥传》中竟把突厥的祖先误认为出自于平凉杂胡。

基于对突厥族源的这种理解，马长寿先生认为，突厥人最初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约在今叶尼塞河的上游。后来受到异族攻击，南迁至高昌北山，到5世纪前叶，在柔然征服高昌时，

① 王日蔚《畏吾儿民族古代史》，载《天山月刊》1935年第6期。

王日蔚《丁零民族考》，载《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

②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③ 林干《近六十余年（1919—1984）国内突厥史研究评述》，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六期。

又被迫迁至阿尔泰山之阳。^①而林干先生则认为，突厥约在公元6世纪时兴起于我国新疆东北部。^②

2、既不能简单地认为突厥是匈奴的别种，或匈奴的苗裔，也不能说丁零就是突厥，或突厥就是丁零。

周连宽先生认为，匈奴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据苏联考古学家在郭尔诺——阿尔泰省区（Горно-Алта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所获的材料，已证明在突厥发祥地的阿尔泰山南部，远古的居民也象米努辛斯克盆地一样，是属于长头的欧州人种，至纪元前5至6世纪时始渗入蒙古利亚人种的因素，于纪元初即已形成突厥人的类型。”因此，突厥种是广泛地指欧州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混合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不能与匈奴划等号。另外，虽然突厥与丁零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发祥地密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极相类似，但是这两个种族各有各的发祥地，各有各的发展历史，尽管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相似，但是它们各自为族，决不能混而为一。^③朱伯隆先生的观点与之基本相同。^④

关于突厥的发源地周先生认为，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的“西海”，当为准噶尔盆地的“额毕湖”（Ebinor），而突厥每岁遣重臣往祭先世所居之窟必离此湖不远，其地当在空格斯河和额毕湖以东。结合阿尔泰山南部的考古资料，突厥的发祥地应在阿尔泰山的南部。

3、突厥既非与匈奴同种，亦非源于平凉杂胡。

岑仲勉先生认为：突厥以狼为祖的传说，“与我国履迹感生无异。大抵犬狼之族，繁于北方，故浑沌草昧者引以为征，是固不足深求，亦无可置信。”至于言其为匈奴别种或平凉杂胡，“然古人

①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 林干《突厥社会制度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③ 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④ 朱伯隆《丁零新证》，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用‘别种’字，往往与‘别部’同义，其语甚泛，不能作种族同原说之引援。五胡入主而后北方民人相次南徙，魏太武之初，敕勒已入居云中，河西突厥种落，间有入居平凉者，是不足怪。然谓发源关陇，后乃北迁，恐非信史矣。”突厥崛起时的住地，岑先生认为应在“金山之阳”。^①

4、突厥来自中原。

突厥碑文中先后出现有：“夏后余基，惟天所置。”^②“郁矣层基，克承大禹。”^③“首自中国，雄飞北荒。”^④“赫赫文命，祀绝于商”^⑤等语。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突厥人显然认为自己的祖籍在中原，他们是夏后氏之苗裔。白寿彝先生则根据“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之说，认为平凉在汉朝属于安定郡，位于内地，可见“突厥原来也是中国人……原来也在中原，是后来迁出去的。”^⑥

5、突厥之先祖出于塞种，近祖即出自臣于沮渠北凉的平凉杂胡。

此说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薛宗正同志所创。他把中国史籍中所有关于突厥族源的传说揉合在一起，并参之以其它有关的史料进行了多层次的考据。他认为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发迹古邈，在史前时代曾进行了多次迁徙。他根据《北史》中关于突厥之先居于“西海”之右的说法，认为“西海”即咸海，海西为斯基泰人中的 Massagagtae 部落的游牧地区。而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人所称的 Saka，亦即我国史书中的塞人。在公元前 4 世纪时，他们迫于亚历山大东征的压力东迁漠北，进而成为我国汉魏之际的呼揭、

① 岑仲勉《突厥种族原起说》，载《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1958 年 10 月版，下册第 962—964 页。

② 《艺文类聚》卷七六《京师突厥寺碑》。

③ 《大唐故右骁大将军薛国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参见《突厥集史》下册第 779 页。

④ 《阙特勤碑》参见《突厥集史》下册第 827 页。

⑤ 《苾伽可汗碑》参见《突厥集史》下册第 841 页。

⑥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2 月版。

乌揭、呼得，他们亦即传说中的索国。后来其国亡而成为匈奴的赘虏。匈奴既衰，南奔而为晋末乱世之杂胡。突厥近祖即出此臣于沮渠北凉之平凉杂胡。至魏太武帝灭北凉，皆随同沮渠氏亡奔西去，发敦煌、鄯善、焉耆而后至高昌。待沮渠氏西域政权覆灭，阿史那氏匿于高昌北山，并一度臣服于高车。516年茹茹主丑奴兴破高车，阿史那氏改臣茹茹，因茹茹与高车相争，迫切需要一骁悍部落为之守境，阿史那氏勇敢善战，恰中此选，于是又迁居金山。至此，历史上开始出现了以突厥（Turk）命名的部族共同体。阿史那氏北徙金山之后，无异于陷身于铁勒（Dil）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此环境的薰治下，原出西海塞种的阿史那氏全盘铁勒化了。公元516年至552年期间，是阿史那氏进一步定型化为突厥族的时代，而突厥族的形成，则是阿史那氏与高车、铁勒族结为一体的产物，因而突厥汗国实质上也就是铁勒化的塞人建立的。根据薛宗正同志的观点，突厥人的发祥地经历了一个由西而东，复又由东而西的反复变迁的复杂过程。^①

6、突厥族的阿史那氏是乌孙后裔。

此观点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钱伯泉同志提出。据《元和姓纂》卷五记载：“阿史那氏，夏后氏后，居涓兜牟山，人呼为突厥窟，历魏晋十代为君长，后属蠕蠕，阿史那最为首领。”钱伯泉同志认为，涓兜牟山即 Qong tumaktagh，意为“大高帽子”，指今乌鲁木齐以东的博格达峰。阿史那氏早在魏晋以来，曾经有十代做过当地游牧部落的君长。到臣属柔然时，才成为突厥族的最高首领。不过，魏晋时代阿史那氏虽然是君长，但不会是突厥族的君长，突厥族是在臣属于茹茹之后，也就是公元5世纪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以前，阿史那氏属于什么国族？无疑应该是乌孙。因为第一，据《北史》、《隋书》中突厥发源于高昌北山的记载可知，

① 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突厥阿史那氏最早居住的洞穴就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博格达山周围。从西汉到唐朝，一直都有乌孙人的后裔在天山中游牧，可见阿史那氏与汉朝的乌孙有关联。第二，从突厥阿史那氏的族源传说和张骞所述的乌孙早期历史来看，同是国破家亡，只剩一个小孩，后为狼所救，终于复国，这绝非巧合，一定有其内在联系和前后继承性。另外，乌孙与阿史那氏都是以狼为图腾，因此突厥阿史那氏很可能渊源于乌孙。第三，阿史那的原音为 Asna，乌孙的原音为 Usun，而“乌”（U），古代读音为（a），这就是说，汉代的乌孙 Usun 应读作 Asan。从汉朝到南北朝，在长期的语言变化过程中，Asan 这个名词产生了后一元音“a”的位移，因而也就变成了 Asna。所以阿史那实际上就是“乌孙”一词演变而来。对于突厥源于平凉杂胡说，钱伯泉同志认为，公元 460 年柔然灭高昌的北凉残余政权，沮渠家族及其带到西域来的“杂胡”，很可能沦为柔然人的奴隶被迁往天山以北的柔然地区。后来突厥族强盛起来击灭柔然，这些“杂胡”自然加入了突厥人的行列。因此，突厥族中有“杂胡”的成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若说阿史那氏是“杂胡”，北魏灭北凉时阿史那氏以五百家奔茹茹，则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北朝史籍中找不出这方面的根据。另外他还认为，伊质泥师都为匈奴贵族常用的姓名，从伊质泥师都这个名字出现在突厥族源的传说中看，突厥与匈奴颇有关联，突厥族中包含有许多匈奴血统的人。而铁勒人为匈奴后裔，传说中的索国当为铁勒国，因为铁勒又译为敕勒或赤勒，索、赤、敕三字的发音极近。总之，突厥族是以乌孙后裔阿史那氏族为中心，集结众多操突厥语的铁勒部落组成的。其中还有少量来自河西走廊的“杂胡”。^①余太山同志亦认为突厥王族完全可能源于乌孙，而乌孙与组成 Sakas（塞种）人的四个主要部落或部族之一的 Asii 是同源，显然乌孙也应

^① 钱伯泉《突厥族名、族源传说和初期史实考》，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 2 期。

是印欧人种。因此“突厥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阿尔泰族与印欧族的混血种。”^①

关于突厥的发祥地，钱伯泉认为是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博格达山周围。^②

7、突厥人原来本应属于蒙古人种。

陈鹏同志在《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上所撰写的《突厥人的今昔》一文中曾经这样指出：“突厥人原在我国北部、西北部过游牧生活。应属蒙古人种。后来，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部分西迁了，最远的到达地中海岸边。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人种类型遂有了变化。如果说，最东端的雅库特人是纯蒙古人种，那么越往西就越不纯了，越往西欧罗巴人种的类型特点越明显。最后，最西端的地中海岸边的土耳其人与最东端的雅库特人、土瓦人等在入种类型特征方面已经联系很少了。”当然，陈鹏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突厥人”，是指“包括世界所有讲突厥语及前不久放弃突厥语转用其它语言的民族。”但是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却不难看出，最早生活在蒙古高原上而尚未大规模西迁时的突厥人显然都应属于蒙古人种。

一些外国学者对于突厥的族源、发祥地等问题也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主要以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的观点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突厥属于铁勒，而突厥之先出于“平凉杂胡”之说则为史官的伪造。由于突厥人祭祀先窟的兜鍪山就是博格达山，因此他倾向于突厥国的发祥地并不是阿尔泰山，而应该是天山的一角。^③

此外，西方学者帕克则把突厥阿史那氏的发祥地金山，比定

^① 余太山《乌孙考》，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② 钱伯泉《突厥族名、族源传说和初期史实考》，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③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